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1)04-0086-05

中国大陆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实证分析

苗学杰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通过对大陆2000年至2010年145篇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随机抽取的30篇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在态度上,研究方法意识淡薄;在认识上,混淆了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在论证中,偏重于二手资料,原始证据不足;在质量上,研究结果缺乏检测。针对比较教育学研究论文的实际情况,给出以下对策:增强整体方法论意识,提高研究方法课程的有效性;确立原始资料优先原则;运用三角验证检测研究结果。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学位论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G643.8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大陆从1985年开始招收比较教育学博士以来,博士生培养取得了巨大进步,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率在数量上逐年增长,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探讨仍缺少实证的分析。博士学位论文是衡量博士研究生是否具备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依据,其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水平,进而影响到学科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作为一门渐成显学但又身负危机的二级学科,时时遭受圈外学者的非议,对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审视,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还能对未来比较教育学博士生培养方案和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导和预测意义,鉴于此,本论文主要从科学研究的视角考察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研究方法

(一)基本情况与样本选择

收稿日期:2011-07-06

作者简介:苗学杰(1983-),男,河南焦作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教师职前培养阶段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SSXP125)。

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学科专业名称”为检索项,“比较教育学”为检索词,学位年度从1999年到2010年,一共检索出145篇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在授予单位上,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89篇)、东北师范大学(31篇)、西南大学(21篇)、南京师范大学(3篇)和浙江大学(1篇);在籍贯上看,中国作者139个,外国作者6个;在研究主题上,涉及到课程改革、教师教育、公民与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全纳教育、国际理解与交流、多元文化、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等多个领域。

从145篇论文中随机抽取30篇论文作为分析对象。时间跨度为2000到2010年;从研究主题来看,涵盖国别研究、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比较教育学三大领域,其中国别研究17篇,问题研究12篇,方法论研究1篇;从作者来看,大陆学生27位,留学生3位;从授予单位来看,涵盖了大陆五个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样本分布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前大陆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现状。

(二)分析方法

把30篇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按照授予单

位(U)、授予年度(T)、研究主题(T)、作者国籍(C)逐一编码,例如 U_S-T10-T_R-C_C 就表示 S 学校 2010 年通过的以国别研究为主题、作者为中国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分析维度上,一是分析作者对研究方法理解和重视程度,本调查以研究方法表述(内容)和篇幅(形式)占整个研究论文比例为判断依据,反映研究者研究方法意识的强弱程度和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尽管研究方法表述篇幅的多少并不完全能代表研究者研究方法意识的强弱,但在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中,寥寥几句研究方法的描述不能反映研究者具有清晰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是没有疑义的,所以,权且把研究方法篇幅作为衡量方法论意识强弱一个外在指标。二是分析作者对研究方法的运用,考察其在论证过程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以此为依据来印证作者对研究方法的理解程度,揭示出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撰写和运用出现的问题,三是分析其研究结果的检测,从而揭示研究者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二、研究结果

(一) 研究方法意识淡薄

研究方法在 30 篇博士学位论文中位置: 5 篇博士论文没有明确提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除 1 篇留学生论文(U_e-T07-T_R-C_f)和 1 篇大陆作者论文(U_e-T05-T_P-C_C)把研究方法单列成章之外,其余 23 篇均把研究方法作为绪论/引言中的一节,或者一节中的一点呈现在博士论文中。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 30 篇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章节篇幅在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比例为: 0.97%, 1.52%, 3.37%, 1.03%, 1.52%, 1.43%, 1.24%, 0.38%, 0.00%, 0.00%, 0.58%, 0.70%, 0.00%, 1.50%, 0.26%, 0.00%, 1.50%, 0.36%, 0.00%, 2.78%, 0.62%, 0.56%, 1.45%, 1.61%, 1.42%, 0.57%, 4.04% (U_e-T05-T_R-C_C), 2.85% (U_S-T10-T_R-C_f), 12.16% (U_e-T07-T_R-C_f), 10.00% (U_R-T06-T_R-C_f)。从中可以发现,相对于国外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单独成章且权重较高的情况,大陆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内容在博士论文中权重整体偏低,多数维持在 2% 以内,还有 5 篇文章(占到总抽样的 17%)没有报告自己的研究方法。饶有兴趣的是,3 篇在华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权重高于大陆的博士学位论文,

且随着使用语言的差异呈递减趋势: 用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篇幅权重最高(12.16%, U_e-T07-T_R-C_f), 用双语撰写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篇幅次之(10.00%, U_R-T06-T_R-C_f), 用中文撰写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篇幅权重相对较低(2.85%, U_S-T10-T_R-C_f), 接近大陆学者研究方法权重的平均水平, 这是否隐含着大陆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训练对留学生的影响程度, 还有一篇权重相对较高的作者在攻读博士期间到国外进行访学(4.04%, U_e-T05-T_R-C_C), 这种现象应引起我们注意。从研究方法的撰写篇幅来看, 大陆学者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意识还是比较单薄。

(二) 研究策略概念等同于研究方法设计

如果说篇幅长度只是一个外在指标, 那么研究方法表述内容则可以作为内在指标衡量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认知程度。从研究方法表述来看, 除去没有谈及研究方法的 5 篇论文和单独成章的 2 篇论文外, 有 23 篇论文在阐明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出现以下问题: 第一, 把研究策略当成研究方法, 例如“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 在……收集了……篇文献”(U_S-T10-T_R-C_C); 第二, 列举研究策略概念和特征代替自己的研究方法, 只有方法的定义描述而在论证中缺少方法的运用。如“比较研究法是一种……的方法, 所以是分析本文的基本方法(U_e-T07-T_R-C_C)”、“本论文在考察某国各个时期的教育模式时, 将运用到比较法, 以便认识到……的主要特征(U_R-T08-T_R-C_C)”、“社会科学的重要目的和价值就是对……进行解释, 解释是一种……方法, 所以本文采用了历史解释法(U_R-T10-T_R-C_C)”等。第三, 尽管有些论文标明了研究策略, 但仍未清晰地告诉读者是如何运用这些策略来分析资料。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研究者混淆了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我们常常列举的案例法、调查法、人种志、行动研究、扎根理论等只是研究策略, 是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研究方法还包括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框架的提炼, 是一项整体“设计”, 策略仅为其中一部分, 是实现研究方法的手段, 这也是方法和方法论必须作为一章的重要原因, 因为较少的篇幅无法详细展现方法和方法论的丰富内容。

(三) 在研究类型上仍偏重于“定性研究”

30 篇博士学位论文除了 2 篇进行质的研究之外, 其余的在研究类型上属于“定性研究”, 这种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 发挥的主要是

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工程”^[1]，在 28 篇博士学位论文中，有些论文引证文献来源主要是外文文献，但仍然是以既有研究成果为主，也就是二手资料为主（U_{IT10}-T_{ITC}），而有些国别研究，引证文献多来自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U_{IT08}-T_{ITC}），这两种主要的引证文献共同的缺陷就是学位论文不是建立在原始资料（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导致本应具有创新性的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成了“研究的研究”，甚至类似于一篇大的国外文献综述。这种定性研究不同于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后两者都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属于实证研究。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差别在于，收集资料的性质不同：数字型的精确数据和非数据性的数据；收集的资料方法不同：量表、问卷和观察与访谈；分析资料和讨论资料的方式不同；验证变量的相互关系运用的方法不同，但二者的共同点是研究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交往中，基于实地得到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为研究依据，也就是无论是质的研究还是量的研究都是一种实证研究。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过多依靠既有研究成果作为引证文献，这种状况令人担忧。

（四）忽略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研究的信度是研究者的论证或结果能否让别人相信，需要记录并随时展现在研究过程中的证据，信度主要关注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如果在相同或相似条件下再做这项研究，会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研究的效度包括内部和外部效度，内部效度主要用来表明研究者在研究策略、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技术选择上的恰当性，研究者通过这些方法的选择是否测量或观察到了他们所声称的内容，外部效度是指这种研究能否得到合理推广。“信度和效度是从自然科学中发展出来的概念，由于和质的研究在认识论基础上存在的差异，用这些概念来衡量定性研究的证据质量和真实性是否有价值，人们都在关注。”^[2]人文社会研究有时候不一定完全能够借用自然科学的信度和效度来描述研究的精确性。但作为一种严谨和科学的学术研究，依然需要证据的确定性、证据的确实性、证据的持续性、证据的可靠性代替信度，用可信性和可转移性来代替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3]。研究问题的答案，也就是研究报告的核心观点，应该建立在理由的基础上，而将理由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才能使文献研究的成果具备说服力，使读者相信研究者提供的答案。这 30 篇论文除了 2 篇简略报告了研究局限之外，其余都没有报告研

究的信度和效度。

三、分析与讨论

（一）方法和方法论意识薄弱

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应为一项研究设计，包括大纲、计划、用于解决研究问题所开展实施程序的具体策略，设计如何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从研究方法的表述、研究方法在论文中运用等显露出来的问题表明，在比较教育学博士生培养方面，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训练一项仍存在许多不足，致使能够撰写出博士论文的“文章”，但却没有学会如何科学地开展“研究”，撰写研究方法的时候，不得不以方法的概念和定义代替自己研究设计，即使有些作者结合了自己的研究内容，但也只是只言片语与研究方法概念强行结合，没有理会研究方法的真正意义。以历史研究法为例，历史研究法并非仅仅像作者所描述的，“本文考察了……变迁及在各个时期的……特点”（U_{IT08}-T_{ITC}），历史研究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研究方法，“比如说史料的来源：文件与档案，大众传媒与图书资料，遗物与遗迹还是口头证明；史料的种类：直接史料还是间接史料；史料的性质：史料的真伪问题，因为有多种原因可能导致即使是政府颁发的文件，也可能因为党派利益或其他反对外在因素而导致现实中的失实”^[4]，还有历史的分期是否合理，采用何种分期的依据等。在撰写研究方法时候，需要对如何运用这种方法，像如何收集资料，如何辨别资料，如何分析资料等研究设计作出详细说明，而非仅仅用研究方法的概念和定义来敷衍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设计。

（二）资料的性质未加辨别

相对于具有同等学科性质的世界历史中已经出现“史料优先渐成趋势”的局面，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在原始证据使用上显得单薄，资料的收集呈现随意性和随机性，导致研究论文成为“研究的研究”，一篇大的“研究综述”，从而背上贝雷迪所描述“骡子”的恶名。当把他人的研究成果当成原始资料时，人们往往对这种“研究的研究”产生怀疑态度，因为报告人没有足够的自己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时候，就需要作者对作为证据的“他人的研究”的真实性做出说明，包括他使用的方法和收集的数据等，而这点在比较教育中往往很难。举个例子，研究某国的某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假若说研究者在对象

国考察了政策出台方背景、政策的实施主体态度、政策的实施对象各方面的感受和实际情况,那么在回答研究资料收集的严谨性后即可说明提供证据的可靠性;如果以某国学者的研究作为研究的证据,研究者也注明了出处,但是研究者还得进一步提供更好的理由或者证据说明作为支撑论点证据的某国学者的研究是可靠的。作为一项研究成果,应该是证据、理由、观点之间循序支持的完整报告。特别是比较教育中常用的文献研究,绝不是从外国一本著作、一份资料和一段个人观点中找到支持,就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问题关键在于作为证据的资料是否为原始资料,否则呈现的证据往往是不充分的证据,有时候即使用原始资料作为自己的论证证据,依然面临着证据不充分性的危险,这是由于研究性质决定的,还需要资料与资料的相互印证。

(三) 地域的限制导致实证困难

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实验室操作实验收集的数据作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人类学以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后的详细描述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那么大多数人文学科则多以著名学者的言论或者文本自身作为支撑其观点的证据,如果自然科学以世界是相对于观察者来说是客观和独立的,所以能够测量,人类学研究是以研究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现场,通过观察和采访等实证手段获得可信度,以国别研究和问题的比较教育来说,由于远离现场的地域限制,使得采用实证方法比较困难,所以,作者们的论证基础大多基于文献,以文献为基础的比较研究,必须寻找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正如哈默斯利(Hammersley)所说,“如果说一个理由精确地反映了我们想要描述、解释或理论化的现象的特征,那么这条理由就是有效的或者说是真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一个理由是否为真,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完全可信的通往真实的道路,所以,我们只能依靠用来支持描述现象的证据的足够的充分性来判断研究是否可信”。^[5]根据这个道理,在具有复杂情境、多重变量等不易检验研究信度和效度的人文社会研究中,特别是无法到达研究现场远离研究对象的非参与性的大陆比较教育学博士生来说,只能依靠证据的充分性来保证研究可信性,这也是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中必须正视的一个客观条件。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抽样的研究方

法的分析,我们发现,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撰写和运用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方法意识淡薄,方法认识存在误区;论证过程中过多依靠研究成果,原始证据积累不足;方法的信度和效度缺乏报告。这里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影响,针对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 提高研究方法课程的有效性

首先增强研究方法论意识,在比较教育学博士生培养阶段加强博士生研究方法意识的培养,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研究策略、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的框架、资料局限和潜在问题等,是对研究一项整体的设计,包括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分析资料、分析资料所采用的策略等,应从方法论高度理解方法,使博士生具有整体的方法论意识。在前期课程设置上,在开题报告中,在教师指导过程中以及后期的论文写作和答辩环节,不仅要让博士生认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关键还得动手去做,这就需要通过提高研究方法课程的有效性,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硕士培养阶段和博士培养阶段一般都开设了研究方法课程,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原因可能在于把研究方法课程当成一门课程来修,获得的是关于研究方法的陈述性的概念性知识,因此在研究方法课程上,应该学会如何做研究,而不是学会研究方法的概念是什么,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学位论文研究方法撰写时以概念代替设计或者出现望文生义、强行解释的错误。

(二) 确立原始资料优先原则

科学研究重在证据,“证据是确凿的事实,是坚实的证明,是某些我们自己看得到的东西,是论证凭借的坚实基础”^[6],提倡开展实证研究,但相对于比较教育学博士生实际情况,即多数学生并非能够到达国外的研究现场,应当确立原始资料优先的原则。根据形式逻辑的理解,论题是其真实性需要确认的那个判断,论据是确认论题的真实性时所根据的判断,由判定一个或一些判断的真实性,进而判定另一个判断的真实性,就是论证。如果论证的论题是未经确认为真的判断,那么,论证的重点就在于探求,即在于为这个判断寻找理论或事实的根据。^[7]断定论据是真实的,却不同于论据事实上是真实的,因为一个人可以断定一个判断是真的,而事实上这个判断却可能不是真的。博士论文由于其创新性的要求,论题都是未明确为真的命题,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寻找真实的论据并判断论据的真实性,二手资料

作为研究证据的真实性是二手资料的研究者赋予了真值,在研究中还需要对事实的真实性做出研究者自己的判断,所以,必须根据研究对象判定原始资料,确立原始资料优先的原则,即使收集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还需要对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做进一步分析,在不能达到现场的情况下,就得运用三角验证增强信度和效度。

(三) 运用三角验证增强研究信度和效度

三角验证是一个研究信度和效度有效的方法。三角验证“最初来自于土地调查,知道一个地标仅仅能够标明你位于穿过该地标的直线上,如果再知道两个地标,就能够在交叉点确定你的位置”^[8],1970年被质性研究学者丹因(Denzin)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三角验证的逻辑是,一种方法不足以解决多因素影响的问题。因为每一种方法都能够揭示实证研究的不同的方面,所以,我们应该运用多重研究方法。丹因定义了三角验证的四种类型:第一,数据三

角验证,研究者尽可能多的从多种渠道收集有关分析对象的资料,使用多种多样资源数据的三角验证就可以用同一种方法使理论分析效果最大化;第二,调查者三角验证,简单的理解就是应该安排多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观察者,多个观察者降低了单一观察者可能带来的偏见,提高观察的可信性;第三,理论三角验证,一般来说,我们只收集与研究和数据维度有关的用来指导研究的数据,但是在分析数据的时候如果能够以多重视野的假设分析数据,就显得更有价值,多种理论观点应该并列起来评价他们的有效性和解释力量;第四,方法论三角验证,使用多种方法研究单个问题或项目,包括方法内的三角验证和方法间的三角验证,方法内的三角验证就是通过不同的维度验证,方法间就是结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验证。^[9]根据比较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应采用三角验证的方法来提高论文的信效度。

参考文献:

- [1]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23.
- [2] Jane Ritchie and Jane Lewi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270.
- [3] Jane Ritchie and Jane Lewi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271-273.
- [4] 董奇, 申继亮. 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5: 323-349.
- [5] Hammersley, M.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69.
- [6] [美] 韦恩·C·布斯, 格雷戈里·G·卡洛姆等. 研究是一门艺术[M]. 陈美霞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133.
- [7] 金岳霖. 形式逻辑[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285.
- [8] Patton, M. Q.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 3rd edition, Thousand[M]. Oaks, CA: Sage, 2002: 247-248.
- [9] Norman K. Denzin,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M].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9: 295-313.

An Empirical Study of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or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MIAO Xue-ji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thirty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andomly selected from a total of 145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between 2000 and 2010, an empirical study was made about th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used for these dissertations. A number of problems were found: a weak awareness of proper methodology, confusion between research strategy and research methods, reliance on secondary sources rather than primary evidence, and relatively low thesis quality due to a lack of sufficient verification. To correct this situ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aise the overall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appropriate research methods, provide effective training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establish the priority of primary evidence, and adopt the process of triangular verification in research.

Key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